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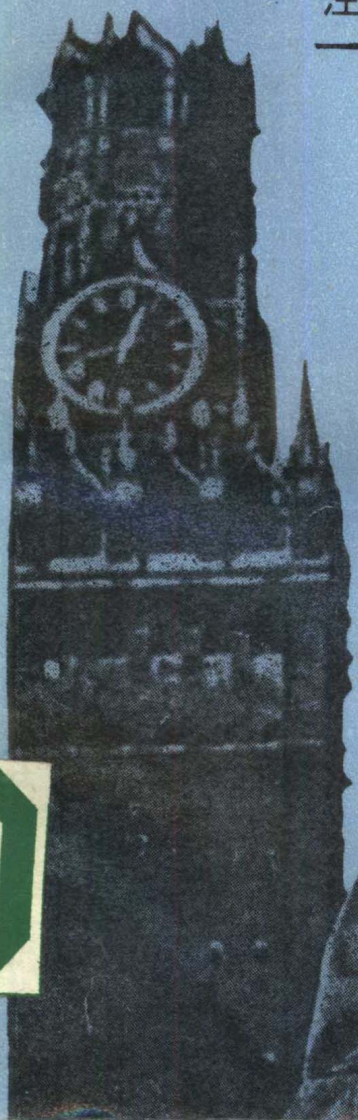
我們時代的旅程

Harrison E. Salisbury

[美] 哈里森·E·索爾茲伯里 著

A JOURNEY FOR OUR TIMES

汪溪等譯



我们时代的旅程

[美]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 著

汪 溪 郑德芳
祁国明 汪 晶 阎雷生 译
汪 溪 校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我们时代的旅程

〔美〕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 著

汪 溪 郑德芳

祁国明 汪 晶 阎雷生 译

汪 溪 校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7.26印张 426千字

1989年9月北京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80053—615-7/1·168

定价，8.45元

序 言

——为中文版作

我将半个世纪以来自己在世界各地采访写作观察到的及我生活经历的个人感受写成了两部书，《我们时代的旅程》是第一部。

中国的读者或许乐于知道，我——一个在美国中部出生的孩子，自幼就向往到中国去，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夙愿许久许久未能实现。直到1972年——闻名于世的尼克松总统访华的那一年，我到北京的第一次旅行才成行。

1930年我从明尼苏达大学毕业时，正值美国经济萧条时期，我未能如愿前往中国，而最终去了欧洲，去报道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英国、北非、中东、苏联的事件。在莫斯科的报道任务结束之后，主编们决定派我前往战时的重庆去报道中国，但，在我接受此任务之前，我又被调回美国，去当时我为之工作的合众社担任国际主编。我转到《纽约时报》工作时，再次被派往莫斯科，在那里经历了艰难的冷战年月直到约瑟夫·斯大林逝世，步入尼基塔·赫鲁晓夫时代的初期。

这本书反映的是两个重大政治社会现象的各种戏剧性事件——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经济萧条和为阻止阿道夫·希特勒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冒险政策而进行的全球大战。

尽管我未能在那些年代访问中国，却有幸在莫斯科结识了中国的两位伟大朋友——埃德加·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们到莫斯科来报道苏联红军抗击纳粹的伟大斗争，那时我也正在肩

负同样的使命。

斯诺同我成了好友，我们的友情一直持续到他辞世。我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之间，虽然友情不那末深，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仍然鸿书往来，她在北京，身处混乱之中，我在美国或世界性记者生涯中去到的世界其他地方。

对新闻报道和驻外记者我只想说一两句。我认为这是我们写作职业中最有价值的工作之一，特别是如果你具有敏感、见地、又具有某种直觉选择对世界事务有重大意义的地点、形势和国家。中国一直是一个这样的国家，一如苏联。我想，已有一些最优秀的记者将他们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同样，有一些对俄国和苏联也是如此。我还感到，虽然驻外记者常常由于语言和背景知识的准备不足遇到障碍，却能运用自己在其他不同社会的经验，从特定的地区，譬如说从中国，用电讯发出所在国的人们漏掉的一些分析性观察的报道。驻外记者具有捕捉新鲜事物的眼光，有进行比较的能力。他见到过其他国家的人民如何处理类似的问题。他的评价可能并不只是为美国或其他外国读者服务，也可以对他所报道的国家的读者有益。

在这方面，我特别推崇埃德加·斯诺的工作。他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对中国有深入的了解。毫无疑问，我想斯诺发自中国的报道，比任何中国人的报道更具有丰富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洞察力也可以这样评价。她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联系和接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直接的、得天独厚的。另一位与斯诺和斯特朗自然而然联系在一起的是卓越的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美国和全世界从他们的杰出的三重奏中获益匪浅。还有其他许多人的名字可以加进这个名单中。

也许我可以这样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也曾以同样的方式受益于卓越的外国观察家。他们大多是英国人，但也有无与伦比的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译注)

以及晚些时候的中国作家林语堂。

有时人们问起这本书的书名的含意。我解释道，这确实是我一生的旅程，我为之献身，谋求竭尽全力去披露困难的、重大的、有时是很危险的形势下的客观事实，从而有助于向世界提供它面对的一些问题的更为真实的图象。

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

1989年3月

目 录

第 一 章	战争的孩子·····	(1)
第 二 章	培育一个爱国者·····	(9)
第 三 章	罗伊尔斯顿大街·····	(19)
第 四 章	犹太居民区·····	(27)
第 五 章	索尔兹伯里医生的儿子·····	(40)
第 六 章	我的儿子是作家·····	(50)
第 七 章	成长·····	(67)
第 八 章	成年·····	(80)
第 九 章	新闻记者·····	(94)
第 十 章	大萧条·····	(109)
第 十 一 章	一步登天·····	(121)
第 十 二 章	休伊·····	(131)
第 十 三 章	前夜·····	(141)
第 十 四 章	走向战争·····	(152)
第 十 五 章	英国将永生·····	(170)
第 十 六 章	进入伦敦社会·····	(186)
第 十 七 章	伦敦日记·····	(201)
第 十 八 章	俄罗斯! ·····	(217)
第 十 九 章	列宁格勒·····	(230)
第 二 十 章	“斯大林事件”·····	(241)
第 二 十 一 章	大都会饭店·····	(257)
第 二 十 二 章	父亲之死·····	(274)

第二十三章	旅途中.....	(284)
第二十四章	又回国了.....	(296)
第二十五章	新的开端.....	(311)
第二十六章	回到莫斯科.....	(322)
第二十七章	奥莉加.....	(336)
第二十八章	另一个世界.....	(350)
第二十九章	一个克格勃阴谋.....	(361)
第三十章	独家新闻.....	(376)
第三十一章	萨尔台奇哈.....	(387)
第三十二章	朱莉.....	(402)
第三十三章	乔治·弗罗斯特·凯南.....	(413)
第三十四章	阴谋.....	(427)
第三十五章	斯大林.....	(441)
第三十六章	斯大林的遗产.....	(458)
第三十七章	重访俄罗斯.....	(475)
第三十八章	赫鲁晓夫.....	(489)
第三十九章	新日子来临.....	(507)
第四十章	漫长的旅程.....	(527)

第一章 战争的孩子

一个小男孩在黄黄的煤气街灯照不到的雪地里跺着脚缓缓地走着，一个急匆匆缩着脖子顶着寒风回家的工人几乎没看见他。在明尼苏达的11月；这小男孩只不过是房子的黄昏影子里的一个黑点。凛冽的风本不使人产生好奇心，但是虽然天寒、风大又是黄昏时分，这个工人还是注意到了孩子的活动。也许因为觉得奇怪，孩子踩着干雪向曼陀罗的篱笆走去，突然又往回走，来来回回走着，好似在站岗。

这个小男孩就是我，我也确实是在站岗。时为1917年11月下旬。革命在彼得格勒胜利了，那一天晚上，我是儿童团的一个成员。头戴布琼尼式的灰色头盔，上缀红星，足蹬哥萨克靴子，身穿挺长的军大衣，两手套在黑色长统手套里，肩上挎着一支步枪。我来回地在冬宫门前走着，短墙外就是皇宫广场和亚历山大一世的纪念碑的座柱。我偶尔抬头望望皇宫明亮的窗户，看看我自己在雪地上的影子。头盔顶端尖尖的刺刀，被白地衬托得漆黑。这景象太真实了，我是一个儿童士兵在值班放哨。

然后，发生了我知道会发生的事，我母亲在厨房里叫我：“本尼，本尼，该回来了，当心冻死。”

我稍稍等了一下，以表示我既不饿又不冷，也不因我的幻觉害怕，就离开了我自己用雪堆成的矮墙，最后看了一眼敌人埋伏的煤场，那是在罗伊尔斯顿大街黑黑的拐弯处。我急忙走向我祖父盖的那所住宅。我于1908年11月14日出生在这里，以后也一直住在这里。我把自制的木枪放在门背后，把脚上的雪掸掉，走进

了厨房这个光明世界。这里一边堆放着煤，水池是铜的，里面的焊接处看上去象一幅凸起的欧洲地图。房间里各种气味扑鼻而来：沙锅里的豆子和糖浆在沸腾，褐面包，锅里的咖啡和新鲜的面包散发着香气。

我挂好了头盔，原是一顶红白相间的软帽，军大衣。那是一件羊皮里的短大衣；放好了兔皮做的长手套。我站在那里，一个9岁的四年级小学生，穿着一身羊毛织的连衫裤，法兰绒衬衫，深褐色的灯心绒裤子，黑色长袜，外面套了一双厚厚的羊毛短袜，齐齐地翻出在鹿皮靴的上边。我突然觉得又冷又饿，脸也皱了，鼻涕直流。彼得格勒，冬宫，儿童团都不见了。我坐在餐桌边和我的父亲、母亲和7岁的妹妹珍妮特一起，面前是一盘滚烫的猪肉烧豆子。

我父亲问道：“你在外面院子里干什么？”

“就是玩儿呗，”我说，目光下垂，一面伸手去取蕃茄沙司的宝石红一样的瓶子。

我曾一百次地回想起那个9岁的孩子，特别是在驻俄国的漫长岁月中，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那时真的“就是玩呗”。

我记得我初次听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是在一两个月之后，1918年2月初，正当托洛茨基向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德国特命全权大使提出了不战不和的建议。我不曾想到他们将象一条红线贯穿我的一生。

明尼阿波利斯的下午已经越来越长了。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街对面一座出租的褪色的红房子门前站着一个男孩。这所房子里的主人和我祖父一样，在1880年代买了一些当时时髦地段的房子，现在他已卖了房子，搬到别处去了。

这一天下午，我在我堆的雪堡垒里忙着储存一些冰冻的雪球，以便击退从罗伊尔斯顿大街方向来的少年的袭击，或是从我左翼的小胡同里来的进攻。我不时看看街对面的男孩，一个身材瘦长

的少年，皮肤有点黝黑，比我略高，年龄也要大一些，他戴了一条浅褐色的围巾，黑色小帽，深蓝的毛布衬衫外，套了一件有点撕破的红毛衣。他脚上穿着橡胶雨靴，是薄薄的发亮的高到膝盖的，孩子们在春天化雪时常穿的那种。他正在用雪制作一个苗条少女。在我这外行看来，她文雅秀气，与溅满泥水的院子，破旧的房子和由于过往雪橇留下马尿、马粪的街道，很不调和。

我感到一阵妒嫉。我拾起一个雪球，扔到街对面。它飞过去落到雪地上，那个男孩继续干他的。我又扔去一个雪球，仍没有反应。我扔出了第三个，击中了苗条的人像，把她的肩削掉了。那个男孩回过头来喊道，“你这是干什么？”我看到他棕色眼睛里的泪水。我觉得羞愧，站了一会儿，走到对面去，我说，“也许能把它修好。”那个男孩说，“不行，修不好了。”他踢了它一脚，雪姑娘垮了。我问他，“你叫什么？”他说，“鲁本。你呢？”我说，“叫本尼。”我憎恶这个名字。我母亲和妹妹叫我本尼，我已经不高兴了。要是哪一个男孩敢叫我本尼，我非同他打架不可，但是现在我把这个名字告诉他，作为我做了错事的悔恨表示。我说，“本尼，这就是我的名字。”他看了我一眼，这一眼使我难以忘怀。若干年后，在一篇题为《基督在亚洲诞生》的写他的文章里，我写道，他看起来象拉斐尔以前画里的耶稣。

他问我，“愿意来喝一玻璃杯茶吗？我父亲在楼上。”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用玻璃杯喝茶的，我说，“好啊，我很高兴去喝茶。”

鲁本的父亲叫内森·罗生。他给我讲列宁和托洛茨基，俄罗斯和革命，还有沙皇和犹太人，犹太人遭受杀戮，讲了那么多，我的脑袋都装不下了。他逃出俄国是逃命，逃掉大屠杀，逃掉沙俄的25年兵役，更重要的他已成为一个革命者了。他生在白俄罗斯的第聂伯河和索什河之间的一个村子里。这些名字对我毫无意义，后来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到了俄国才对它有所了解。

1941年在戈姆利附近，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交界处，仗打得非常激烈。

内森·罗生，身材瘦高，皮肤有点黑，生性活泼，有绘画天分。当地的一名贵族提出要送他到圣彼得堡去学习，但是他的家庭离不开他。这正是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年轻的内森外貌不大象犹太人，倒象个意大利人。他在茶馆里闲逛，那是个警卫特务和黑色百人团打手聚集的地方，他常把那些人的计划给犹太人自卫团体通风报信。当他被征入伍去打日本时，他那个团叛变了。他设法到了伦敦，他的未婚妻随即也去了。他们在皮卡迪利广场的登记处登记结婚，然后到了温尼泊。1914年8月战争爆发了，他们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内森怕再次被征入伍。

现在他已开始做绘画油漆匠的工作。他们在二层楼上租了三间房间，内森夫妻(妻名伊迪丝)，小儿子哈罗德，鲁本和她的妹妹贝西。鲁本在雪地里堆的就是贝西。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厨房里。那里拥挤地放着一只大衣柜，一把讲究的椅子，雕着鹰头飞狮，雕着爪子，有着黑皮座垫。鲁本喜欢用手去抚摸硬木的光滑的表面。我猜想这件家具一定是从俄国带出来的。火炉上，茶壶水正开着，空气里充满了水蒸气，窗上已结成了霜花。一个大的铜家伙在咝咝作响。一个俄国茶炊，我是头一回见到它。这里一切都是神秘的，外来的，陌生的。罗生先生给我倒了一杯红茶，给了我一块方糖。他说，“这样，照俄国方式喝茶，先把糖含在嘴里再喝茶。”他把糖放在嘴里然后再把茶水吸进去。我还从来没有喝过茶。孩子们是不给茶喝的。茶会抑制孩子生长。咖啡也一样，不给喝。孩子们只喝牛奶和可可。罗生先生似乎不知道这一点。他也不管我喝不喝茶。他太兴奋了，他在谈俄国，他用的词和他的口音使我不能完全听懂他的话。

他说，“发生了异常重大的事情。世界在改变着。沙皇完蛋了。克伦斯基也完了。托洛茨基和列宁正在改变着世界。战争结束后，

革命将横扫欧洲——先是德国，然后法国和英国。甚至在这里，美国。你将在报上看到。”我能看出鲁本对他父亲滔滔不绝有点不好意思。他安静地说，“爸爸，也许革命到不了这里。”罗生先生说，“你等着吧，你看报好咧。甚至这里，革命已经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记着卡尔·马克思说的话，还有恩格斯说的话。”

我想要告诉罗生先生我怎样在为冬宫站岗，但是他讲到的是真正的革命。他是从真正的俄罗斯来的。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我只是在玩，是根据《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只眼睛戴黑罩的那个叫吉本斯的记者的报道设想出来的游戏。吉本斯是我的英雄，他还有潘兴将军，基钦纳伯爵（我最喜爱的——我不能相信他在汉普郡号上失败），伊迪丝·卡维尔，比利时国王和明尼苏达州的151野战炮兵的利奇上校。上校和我母亲一起上中学，她说，他很英俊但是很笨，考试时，她不得不把答案小声地告诉他。后来利奇将成为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他穿着军装竞选，很英俊，但是仍然不知道答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我的生命。我坐在舅公的腿上学习看报，从《明尼阿波利斯日报》上，指出马恩河大战的标题。舅公是我父亲的舅舅，姑普里切特，参加过夏洛战役，经历过安德烈维尔监狱的苦难。这使他脑子有点糊涂，有时把糖放在汤里，以为是燕麦。他心地仁慈，和我们住在一起，照管两只锅炉，这所房子很大因而一只不够用。有一天他在厕所里不住地生火，而且还抱怨通风不好。这以后，他住进了一家私人疗养所。

1918年我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涯。我第一篇作品是题为《大战争》的历史论文。它占了我的绿色练习本整整七页（包括铅笔画的插图和地图）。我是用这些话开始的：“1914年——德国对法宣战，时为1914年8月1日。法兰西全国震动。”

那一天我在罗生家里没有呆很久。我没吃蒜肠，香料烤饼，苜蓿泡菜，黑面包和鲱鱼。我母亲给我严格地规定，要是没有得

到准许，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去男孩子家里去玩。我很快出了罗生家，过了煤气灯发着又黄又柔和的光的大街回到我的家里。我已经有了关于俄罗斯的第一次经验。我认为我10岁以前是个布尔什维克，到了11岁我已戴上选潘兴当总统的纪念章。

1944年我终于去了俄国，开始了我漫长的记者生涯，成为苏联事务的专家和历史家。我终于明白在那广袤的灰色荒原上，哪里也尝不到我儿时橡树湖新区老家喝过的那么浓香纯正的革命的酒。

我生下来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我出生时，爱德华已登基，但是在罗伊尔斯顿街107号；维多利亚仍是统治者。我祖母，玛丽·普里切特·索尔兹伯里，把我父亲打扮成芳特勒罗伊小伯爵，穿上有金线绣的黑丝绒套装。然后从威斯康辛洲的马佐曼尼县，赫德逊大街请来摄影师，让我父亲坐在小藤椅上拍照，他神情悲伤。我父亲给我打扮得象他小时一样，给我也照了相。我憎恶那套小伯爵衣服，但是到时候，我给我儿子迈克尔穿上同样的衣服，把他放在107号客厅里的核桃木沙发上，照了相。这是继承性。

在他心里，我父亲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罗伊尔斯顿街的老宅。我有时也说不清我是否已经离开了老宅。父亲在我进大学，在我家搬到肯伍德希尔以前，才把房子卖了，但是当他晚上从工厂回家，很自然就走过七马路桥，穿过铁道，走过煤场，走到107号，然后才想起来他已经不在这里住了。这是他的家，我的家，我几乎每天都在思念着老宅。在陌生的城市里，我入睡前，就要走遍107号的各间屋子，回忆走廊里黄色的长条地毯，客厅里红色的挂毯，我母亲所喜爱的绘画，《天真的时代》挂在沙发上面，硬木桌子上的七只烛台是我的太姑奶奶从费城还是哪里搬来的，餐厅火炉架上一个温柔的鹿头（我父亲怎能射死它？）；我回忆起我祖父樱桃木的图书室，莎士比亚的大本子带着多雷插图的弥尔顿的《失去的乐园》下面平放着。后来我又发现在弥尔顿的后面藏着牛皮纸

包的《男孩须知》和《女孩须知》；多雷画的火焰中的裸体男女，以及青春的危险，使我有时候深信，地狱是真的。

在文艺书架上有《斯克里布纳》、《哈泼斯》和《世纪》杂志的，我祖父用黑皮子包成合订本。他是一名医生，他看这些杂志。他坐在雕花的樱桃木摇椅上，度过了他的最后一年，他自己诊断出心力衰竭，看看书，打打瞌睡，等待着心脏停止跳动，不久也就果然如此。图书室里有吉本的罗马史，格林的英国史，格兰特的回忆录，有狄更斯，萨克雷，格林利夫，朗弗罗，奥尔科特，爱默生，梭罗，库柏，布赖恩特，一部19世纪的连祷文。从9岁到13岁，我把它全读了。我一面读一面惊叹不已，读完一书架又读一书架。我长大了知道什么是文化——它就是我祖父书房里的书。

1966年新年，我身处北越的乡村，在河内以南85英里。长长的白天我都在狭窄的弹坑累累的路上驱车往南，随时都有美国轰炸机再袭击的威胁。现在我正在敞开的泥地的兵营中垫着稻草床垫的木板床上过夜。我疲倦过度反而睡不着了。我好像听到有人在院子里走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是深入战线后面的一个敌人。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呆的地方叫什么名字。薄薄毯子下很冷，我半醒地躺着，心里有点害怕。最后我不再想河内，战争和炸弹，只想到罗伊尔斯顿街多么安全。我坐在我家那辆黑漆的两轮马车里，父亲驾驭着多利（一匹栗色马），我坐在他边上，母亲和妹妹在后面，多利的蹄子得得地有节奏地，弯过了榆树，踩着刚浇过水的土路。我的黑黑的，英俊的父亲在107号前停车来，我的母亲戴着宽边草帽和面纱保护着她的金黄头发和雪白的皮肤下车登上石台阶；我和妹妹珍妮特跟着她上了爬满葡萄藤的阳台，穿过了橡木大门，进到了门厅，又走过上面半截是花玻璃的门，进入了前厅，前厅的墙上装饰着我舅舅打来的一只麋的头。上面撒了很多驱走飞蛾的红辣椒，我一走近就要打喷嚏。一只水

晶的枝形吊灯在橡木楼梯上发光。橡木楼梯的扶手，发亮而光滑，令人愉快，还使我回想起表妹从楼梯上滑下来短裙上撩与衬裤都露出来的样子。

那一夜在越南的乡间，我走过了罗伊尔斯顿街的那所宅子，一如往常，最后我坐在祖父图书室窗台边的地板上，从窗台上的花盆箱里，翻出我父亲保存的建筑杂志，看着他梦想要在密西西比河上建造的而从未动工的房子的设计，拿出了莱明顿的板画，费城博览会的石印的印刷品，最后是一本紫色与金色的旧书，我父亲年轻时最喜爱的书，《狄克·惠廷顿》。我又听到那句话“转呀，再转呀，狄克·惠廷顿；伦敦镇长。”正好这时伦敦市区的钟声为惠廷顿响起来了。我醒来了，天色未明，但是稻田那边的炸坏了的天主教堂的钟声在召唤黑衣黑长裤的农民去做弥撒，要赶在美国轰炸机在天空出现之前。我打开蚊帐，在清早的寒冷中有些发抖，看见农民们沿着椰树夹道的路，无声地走过兵营去祈祷。突然我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梦中转到了割草机炸弹，汽油弹和药剂橙（越战中美军使用的使丛林叶子脱落的药剂）的现实，这现实是我所爱的美国强加给一个古老的亚洲民族的痛苦与恐怖。

第二章 培育一个爱国者

战争是我童年的光荣。我必须承认那时我内心没有一丝道德上的义愤，我也从来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能跟罗斯福一起说，“我仇恨战争”；我能说我害怕而且也反对过战争，主要是越南战争；但是在核战争没有出世之前，我从不相信世界上会没有战争。但是现在不能设想有另一种世界。

少年时期我周围有许多锡制的士兵、枪枝、玩具大炮、雷管手枪，我强迫或讨好我的妹妹珍妮特，和我一起玩打仗。有一次让她呆在我们挖的狭窄的壕沟里，暴晒在大太阳下，以致她几乎中暑晕过去。

（我后来知道列宁和他的弟弟妹妹在他们的辛比尔斯克的伏尔加河陡壁上的住宅客厅里，也老是玩打仗，觉得很有趣。）

每天晚餐后，我们一家和住在我家二楼的安德烈叔叔和玛丽婶子聚在一起。我们把硬木的留声机上了弦，放《玛德伦》、《蒂伯雷里》、《在前方》等爱国唱片。父亲和叔父很认真地讨论军事战略问题。

我母亲和婶子带领的一个红十字会单位在我家聚会，卷绷带，妇女们都穿白制服，带白帽子。她们卷了成千上万条绷带，编织了1194双短袜子，1003件毛衣和几打面具。我们这些孩子也学会了编织。我不敢想象那些不能不穿我们织的短袜的士兵。

我梦见协约国胜利了。我姑妈苏·索尔兹伯里在法国为女青年会工作。巴黎的一封封来信都写到德国兵及其暴行。我开始觉得惭愧，我父亲没有“在前方”；他是国民卫队倒是真的，也穿军装，